

新華半月刊

XIN-HUA BANYUEKAN

要 目

- 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魯的哲學（人民日報編輯部）
印度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關於“加強印中友誼”的決議
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三篇）
紀念“五四”運動四十周年（四篇）
中蘇友好協會第三次全國代表會（三篇）
匈牙利黨政代表團訪問我國（九篇）
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人民議院代表團訪問我國（四篇）
必須在優質的基礎上高產（人民日報社論）
包產一定要落實（林一舟）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及時做好夏季糧食、油料征購工作的指示
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薛暮橋）
目前歷史教學中的幾個問題（蔣伯贊）
赫魯曉夫同西德社會民主黨一些報紙編輯的談話

1959 10

· 政治之部 ·

关于西藏問題

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魯的哲学·····	人民日报編輯部(1)
讀尼赫魯总理的談話·····	人民日报評論員(8)
印度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加强印中友誼”的決議·····	(9)
尼赫魯三月二十三日在印度人民院就我国西藏地区局势发表声明·····	(10)
尼赫魯四月二十四日会见达賴喇嘛后在記者招待会上发表談話·····	(11)
尼赫魯四月二十七日在印度人民院就西藏局势发表的談話·····	(11)
尼赫魯五月四日在印度联邦院再就西藏局势发表談話·····	(14)
尼赫魯五月八日在印度人民院答复关于西藏問題的討論时发表的談話·····	(16)

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

彭真市长在首都各界人民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游行大会上的講話·····	(20)
周恩来总理在庆祝“五一”节欢宴外宾酒会上的講話·····	(20)
全民动员展开增产节约运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人民日报社論)·····	(21)

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會議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国家机关負責人員在大会討論中的发言(續)

青海草原幸福繁荣·····	官保加(22)
石油科学研究中的新成就·····	张大煜(23)
旅大工业向新的高潮跃进·····	胡明(24)
一个人民公社的瑰丽图景·····	李能(26)
大家都来学拼音字說普通話·····	吳胎芳(27)
人人奋勇向前 个个力争上游·····	罗世发(28)
农业战线的光荣任务·····	邓子恢(29)
开展群众运动完成钢铁生产计划·····	王鶴寿(31)
怎样完成今年的铁路运输任务·····	吕正操(32)
煤炭工业的跃进步伐·····	张霖之(34)
輕工业大变化的十年·····	李烛生(35)
提高服务质量支持生产繼續大跃进·····	程子华(37)
发扬光荣传统, 靠官下連当兵·····	陈再道(39)

貫徹党的教育方針的几点体会.....	程 門 霽(40)
人工降雨試驗成功是我国气象科学发展的新成就.....	張 文 海(41)
鋼产增一倍 鋼材增三倍.....	王 全 煌(42)
广西僑族自治区教育事業大发展.....	石兆棠 赵乐群 莫乃群(43)
教育战线上万馬奔腾.....	陶 淑 范(44)
武汉除害灭病工作获得巨大成就.....	唐 午 園(45)
高等工业学校怎样教学.....	金 錫 如(47)
干劲冲天 措施落实.....	周 建 人(48)
走三县 訪新村 贊公社.....	刘 文 輝(50)
党的民族政策的伟大胜利.....	戴 海(52)
万水千山只等閑 要使鉄路上九天.....	刘 建 熙(52)
“缺”变五“有”.....	李 順 达 申紀 兰(53)
我們的公社正在由穷变富.....	紀 明 逸(54)
努力学习 努力生产 繼續跃进.....	宗 希 云(55)
跃进行列中 妇女創奇迹.....	李 冬 青(56)
系統总结群众丰产經驗 繼續发展农业科学研究.....	丁 穎(57)
期望印度当权的政治家对当前形势善于自处.....	邵 力 子(58)
维护中印友谊是中印两国青年的神圣职责.....	胡 耀 邦(59)
印度扩张主义者的幻想会象肥皂泡一样的破灭.....	桑 吉 悅 希(61)
前綫斗争的胜利和生产建設的胜利.....	江 一 真(62)
陕西省高等院校的跃进与改革.....	原政庭 虞宏正 岳劫恒 陈大燮(64)
知識分子要跟上祖国跃进的脚步.....	茅 以 升(66)
馬井未生角 水却上了山.....	汪 德 昌(66)
不同的民族都走共同的道路.....	張 冲(67)
把鉄路运输推向新高潮.....	李 錫 奎(68)
水生生物科学研究的大转变.....	王 家 棣(69)
大力推广良种、保证粮食更大丰收.....	楊 文 貴(70)
安徽工业一日千里.....	黃 岩(71)
从植物生理学闡明农业“八字宪法”.....	陈 鳳 桐(73)
分配得好可以促使生产得更好.....	李 輝(74)
确保六大設備按期按量按質按套完成.....	刘 宝 田 張 凱(75)
集中全力 保证重点.....	李 耕 蔣(77)
学习普通话 已成社会新风气.....	侯 振 亚(78)
又多又好又早地完成生产任务.....	李 福 祥(79)
凡百事业大有进步.....	安 文 欽(80)
做好电力工业发展规划保证电力工业先行.....	楊 定 安(80)
对西藏叛国分子的支持就是对我国内政的干預.....	陈 其 尤(82)
我平息内部叛乱 与外人絕不相干.....	王 紹 葵(83)
反动的任何阴谋詭計逃不脫人民雪亮的眼睛.....	胡 子 昂(84)

不准扩张主义分子干涉我国内政.....	熊克武(85)
依靠群众排除万难实现计划.....	譚余保(86)
努力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顏福庆 沈克非 王淑貞 胡應廉(87)
为創造万斤稻品种而努力.....	楊匡保(88)
山东工业跃进的几点經驗.....	錢昌照(89)
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松布(90)
包头——建設中的鋼都.....	苏謙益(91)
医学科学跃进再跃进.....	白希清 沈其震 吳执中 吳英愷 吳抗兴 林巧稚 黃家驊 諸福棠 魏曉(92)
拼音字母好处真大.....	徐寿珩(93)
陕西职工的創造性劳动.....	赵占魁(95)
我們享有真正的信仰自由.....	李維光 胡文耀(96)
所謂达賴喇嘛声明是最无耻的扯謊.....	达理札雅(97)
向沙漠开战 要碱地交粮.....	陶峙岳(98)
貴州的贫困面貌正在改变.....	徐健生(98)
关于鋼鐵冶炼技术上的几点意見.....	周志宏(99)
所謂达賴喇嘛的声明純系顛倒黑白的胡說.....	魏志英(101)
妇女彻底解放的伟大理想在我国正在成为现实.....	蔡鵬(101)
講卫生除疾病創造美好生活环境.....	李德全(102)
讓全国人民穿得便宜穿得美丽.....	蔣光鼐(104)
讓新生的水利科学发扬光大.....	张含英(105)
学习多面手 技术大革新.....	张百发(107)
消除疑虑 繼續积极改造.....	王淦堯 史慕康 刘靖基 胡子嬰 胡厥文 荣毅仁 盛丕华 湯蒂因 魏如(108)
西南群山红旗飘 铁路新綫入云霄.....	藍田(109)
大跃进中的辽宁教育.....	車向忱(110)
湘西各族人民跃进接着跃进.....	石邦智(111)
充分发动群众 組織生产高潮.....	安朝俊(112)
改造远未成功同仁亟需努力.....	乐松生(112)
关于鋼鐵工业的几点建議.....	夏以焜(114)
根治黄河 造福亿民.....	王化云(115)
从“鍋台轉”到“机器轉”.....	高鳳琴(115)
昔日大戈壁 今天石油城.....	吐尔逊阿吉(117)
全国賀电、賀信(藏).....	(117)

紀念“五四”运动四十周年

郭沫若在首都各界紀念“五四”四十周年大会上的开幕詞.....	(118)
--------------------------------	-------

康生在首都各界紀念“五四”四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	(119)
胡耀邦在首都各界紀念“五四”四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	(120)
發揚光榮傳統 建設偉大祖國——紀念“五四”運動四十周年(人民日報社論)	(122)

青年工作

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會關於頒布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徽的決定	(128)
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會關於團徽使用和徽章頒發的暫行規定	(128)
立大志，鼓大勁，自覺地加強鍛煉和學習	劉順元(124)

中蘇友好協會第三次全國代表會

偉大的友誼，親密的團結——宋慶齡會長在中蘇友好協會第三次全國代表會上的講話	(127)
中蘇友誼加強着社會主義陣營威力——蘇中友好協會代表團團長費多羅夫	
在中蘇友好協會第三次全國代表會上的講話	(128)
中蘇友好協會總會第三屆會長、副會長、秘書長和理事會理事名單	(130)

匈牙利黨政代表團訪問我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匈牙利人民共和國友好合作條約	(131)
關於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和匈牙利人民共和國工農革命政府代表團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新聞公報	(131)
周恩來總理在歡迎匈牙利黨政代表團宴會上的講話	(132)
明尼赫總理在歡迎宴會上的講話	(133)
彭真同志在首都各界人民歡迎匈牙利黨政代表團大會上的講話	(133)
基什·卡羅伊同志在首都各界人民歡迎大會上的講話	(134)
明尼赫總理在匈牙利駐華大使舉行的宴會上的講話	(137)
周恩來總理在宴會上的講話	(137)
明尼赫總理向我國勞動人民發表的廣播講話	(138)

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人民議院代表團訪問我國

朱德委員長在歡迎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人民議院代表團宴會上的講話	(139)
馬特恩副主席在歡迎宴會上的講話	(139)
朱德委員長在人大常委會擴大會議上的講話	(140)
狄克曼主席在人大常委會擴大會議上的演說	(140)

對外關係

毛澤東主席、劉少奇主席、朱德委員長、周恩來總理電賀捷克斯洛伐克國慶	(143)
中華全國青年聯合會和日本青年與婦女訪華代表團的共同聲明	(143)
我國代表團發表聲明堅決反對亞非經濟合作組織協商委員會關於限制會員國的非法決定	(143)
馬來亞當局又一次對我國不友好的行為	人民日報評論員(144)

· 經 济 之 部 ·

必須在優質的基礎上高產 (人民日報社論) (145)

工 业

冶金工業部召開電話會議決定把提高產品質量提到首要地位 (146)

安全發電 安全供電 (人民日報社論) (147)

關於水電和火電問題的討論 李 銳 (148)

农业·水利

包產一定要落實 林 一 舟 (153)

農業生產措施要同群眾商量決定 洪 禹 (154)

再努一把力,爭取小麥更大豐收 (人民日報社論) (155)

密植 中國農業科學院作物育種栽培研究所 (156)

工具改革 農業部工具改革辦公室 (158)

管好利用好現有灌溉工程 (人民日報社論) (160)

加強防汛準備,為戰勝洪水而鬥爭 (人民日報社論) (161)

糧 食

全國糧食廳局長會議 (162)

財政·貿易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及時做好夏季糧食、油料征購工作的指示 (163)

立即動手,做好征購夏季糧食油料的準備 (人民日報社論) (164)

· 文化 之 部 ·

科 学

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 薛 暮 橋 (165)

目前歷史教學中的幾個問題 蕭 伯 贊 (171)

· 國 际 之 部 ·

德国問題

赫魯曉夫同西德社會民主黨一些報紙編輯的談話 (176)

皮克總統在解放日發表聲明德國人民有權締結和約 (181)

国际关系

赫魯曉夫答“日本新聞社”專務理事本田良介問 (182)

蘇聯政府就日本原子武裝和在日本境內設置外國原子基地照會日本政府 (182)

報刊參考資料索引 (183)

國內外大事記 (187)

新華半月刊

XIN-HUA BANYUEKAN

要 目

- 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魯的哲學（人民日報編輯部）
印度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關於“加強印中友誼”的決議
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三篇）
紀念“五四”運動四十周年（四篇）
中蘇友好協會第三次全國代表會（三篇）
匈牙利黨政代表團訪問我國（九篇）
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人民議院代表團訪問我國（四篇）
必須在優質的基礎上高產（人民日報社論）
包產一定要落實（林一舟）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及時做好夏季糧食、油料征購工作的指示
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薛暮橋）
目前歷史教學中的幾個問題（蔣伯贊）
赫魯曉夫同西德社會民主黨一些報紙編輯的談話

1959 10

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魯的哲學

人民日報編輯部

西藏少數民族騷動的一場叛亂戰爭，已經基本上平息了。叛亂分子所造成的流血衝突，隨着他們的可恥的失敗，在西藏絕大部分土地上停止了。現在，西藏正在面臨着一次和平的革命，這就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決議所指出的，西藏廣大人民期待已久和迫切要求的民主改革。這是一場革命，是1949年前后席卷中國大陸的人民大革命在西藏的繼續。這場革命，在西藏和平解放以來的八年中，一直因為原西藏地方政府的阻撓而拖延了。在叛亂平定之後接着進行的革命，將是一場和平的革命，就是說，不流血的革命。西藏人民對於西藏的沒有參加叛亂的上層階級將採取贖買的政策，就跟在民族地區對待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差不多。因為在西藏人民的背後，有全中國已經完成了民主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的幾億人民的支援，有充分的條件這樣做。

現在世界上很多國家的輿論正在對西藏問題大談特談，這是一件極大的好事。這個從來不曾被人們認真注意過的世界屋脊上的一百多萬人民，完全有權利享受這分光榮，讓全世界注意他們，讓他們在全世界的輿論中得到教育，得到鍛煉。有些外國人說：西藏的少數反動分子的叛亂是“革命”，是“民族主義”的、“反侵略”的、“反殖民主義”的、“反帝國主義”的“革命”，他們應該獲得“完全”的“不受侵犯”的自治或者“獨立”；而人民解放軍在藏族人民的積極支持不對於叛亂的平定，則是“武裝干涉”，是“侵略”，是“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是“希特勒主義”。這樣說的人是西方帝國主義者，是各國的反動派，例如亞洲的岸根介、李承晚、乃沙立、吳庭樞和蔣介石（但是他並不贊成西藏獨立，而要求西藏歸附台灣）。還有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的一部分資產階級，他們的一般政治態度同上述那些人不同，但是在这个問題上却跟帝國主義站在一邊，例如印度的某些資產階級分子。所有上述的這些人在世界上是少數，在本國也是少數，但是他們控制着相當大量的宣傳機器，一時顯得頗為囂張。世界上更多的人說，西藏的叛亂是反動的，平定叛亂是正義的。社會主義各國人民一致支持中國人民對叛亂分子的鬥爭。就是在資本主義世界，站在中國人民方面的也占大多數。他們包括各國的勞動人民，主張正義和進步的人士，和正在反對外國侵略外國干涉的民族資產階級。這些民族資產階級懂得，贊成外國干涉西藏，就等于贊成外國干涉印度尼西亞、緬甸、柬埔寨、尼泊爾、伊拉克、古巴以及亞洲、非洲、拉丁美洲許多國家的內政，等于贊成侵犯這些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

整。但是在有一些資本主義國家，這種正義的聲音暫時沒有那批反中國的宣傳機器所造成的喧鬧高。有些人感覺難過，好端端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好端端的中印友好，如果不出西藏叛亂，豈不更好！他們的心是好的；但是，他們沒有看出，西藏叛亂既然發生了，而又迅速平定了，坏事就变成了好事。西藏的革命被這次叛亂加速了，而西藏的民主化將最終結束外國干涉西藏的歷史，這對於中印友好的真正鞏固也是完全必要的。總之，對於這種不同議論，不但西藏人民和全中國人民應該認真研究，得到教訓，而且許多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民，特別是那些對西藏問題大發特發的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民，也將會加以研究，得到他們所需要的教訓。

我們現在想談談尼赫魯先生4月27日在印度人民的講話。（本報編輯部按：在我們寫好這篇評論以後，我們讀到了尼赫魯總理5月4日在印度聯邦院的講話。這篇講話的主要論點並沒有超出4月27日講話的範圍。所以，我們沒有對這篇評論作任何的修改和補充。）

尼赫魯先生從今年3月17日到4月底，在議會談西藏問題，這是第七次了。尼赫魯先生曾經多次表示同情所謂“西藏人的自治願望”，反對中國的所謂“武裝干涉”。在4月27日，他講的話比較更有系統，本報已經在4月30日全文發表過了。為了讀者的方便，我們現在把他的話再引出一段，這段話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作為他對於西藏叛亂和印度作用的看法的一個提要：

“情況無疑是困難的。一方面，是一個生氣勃勃的、迅速前進的社會；而另一方面是一個停滯不前的、沒有改變的、擔心可能會在改革的名義下對自己採取什麼行動的社會。兩者之間的距離很大，兩者難有任何會合點。與此同時，某種形式的改變不可避免地來到了西藏。交通迅速發展了，西藏長期的與世隔絕的狀態部分地被沖破了。雖然物質上的障礙逐步消除了，可是心理上和感情上的障礙卻增加了。顯然，沖破這些心理上和感情上的障礙的嘗試或者沒有停，或者作了沒有成功。

“如果說這完全要由西藏若干‘上層反動分子’負責，看來這種說法是把一種複雜的情況弄得太簡單地體化了。據我根據得自中國方面的消息，西藏暴亂的規模也是相當大的。這個暴亂的基礎一定是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這種情緒不僅影響上層階級的人，而且影響着其他的人。毫無疑問，既得利益集團參加了暴亂，並且企圖从中得利。試圖用偽為藏語的字眼，描繪和口舌來解釋

情况，是很少有什么帮助的。

“当这些不愉快的事实发展的消息传到印度来的时候，立即引起强烈的普遍的反应。这种反应并不是政府引起的。这种反应实际上也不是政治性的。这种反应主要是一种基于情感和人道原因的同情。它的产生也还基于同西藏人民久远的宗教和文化联系所造成的亲密感情。这是本能的反应。不错，印度有些人的确企图把这种反应引导到不当的方向，而从中得利。但是，印度人民的反应却是明摆着的事实。如果这里的反应 倘且如此，那么人们就不难设想西藏人自己的反应怎样了。也许亚洲的其他佛教国家也有这种反应。当这种实际上不是政治性的强烈情绪存在的时候，那是不能仅仅用政治方法来处理的，更不能用军事方法来处理了。我们一点也不想干涉西藏；我们非常希望保持印度和中国之间的友谊；但是同时，我们非常同情西藏人民，我们对于他们的困难处境感到非常难过。他们仍然希望，中国当局会采取明智的态度，不使用他们巨大的力量来对付西藏人，而根据他们早已就西藏地区的自治作出的保证，争取他们友好合作。首先，我们希望，目前的战斗和杀戮将会停止。”

尼赫鲁所谓西藏的“停滞不前、没有改变的、担心可能会在改革的名义下对自己采取什么行动的社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他没有说明。但是，这正是全部问题的出发点。我们的讨论必须从这里开始，也只能从这里开始。

西藏社会是一个领主庄园制的农奴社会。在西藏，主要的生产资料——全部土地和绝大部分牲畜，都属十三种领主，也就是农奴主，即官家（封建政府）、寺院和贵族。这三种农奴主只占西藏一百二十万人口中的百分之五左右，即六万人左右。所有的农民都没有自己的土地，大部分农民都没有自己的牲畜，只能为农奴主劳动。他们自己，连同他们的子女，世世代代，都分别隶属于不同的农奴主。农奴主的领地一部分属于专为封建政府差遣的土地，被分配种这些土地的农奴要无偿地负担封建政府各种名目的差役。兵役也由这些领地上的一部分农奴担负。其余的领地是农奴主的所谓“自营地”。在这块土地上，农奴要用自己的耕牛农具（有时还要带自己的伙食）为领主耕种全部土地，而领主只给一小块（约占领主土地的十分之三）不好的份地给农奴作为代价。农奴每年要用绝大部分时间在农奴主的土地上劳动，并且要为农奴主作各种无偿的劳役。在以上这两种领地上，农奴的劳动收入的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成为农奴主的剥削收入。农奴的收入一般都难于维持生活，因此不能不向农奴主借高利贷。大批农奴所欠的债无法偿还，以至有已经欠了几百年的债。农奴不但没有任何政治权利，而且没有普通的行动自由，短期外出也必须由领主准假。

西藏的贵族是世袭的。西藏现在约有贵族三三百家，其地位高低看财产多少而定。大贵族约占贵族总数的十分之一，即二十几家，他们每家都有几十处庄园，成千上万个农奴。西藏封建政府的力量始终掌握在这些大贵族手中。贵族和农奴等级的界限很森严。农奴见了贵族要回避或鞠躬吐舌，表示敬畏，请路也要有一定的请法，不许错踏。贵族对逃亡的农奴或者其他被控为违法的农奴，可以任意用刑。除了最通常的鞭打以外，甚至还有割眼、割鼻、割手、割脚筋、挖膝盖骨等各种骇人听闻的酷刑。

西藏的寺院在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寺院的

正当宗教活动和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必须加以保护和尊重的。但是，西藏寺院的统治者，到目前为止，却都同时是农奴主。寺院在高利贷和商业方面对于农奴的剥削，比官家和贵族更苛刻。寺院对农奴还多一重以宗教名义进行的剥削。寺院内部也是等级森严，农奴出身的贫苦喇嘛和小喇嘛，在寺院中也是被剥削者。寺院内也设有各种刑具和牢房，对于农奴和下层喇嘛可以任意处罚，其残酷的程度跟其他农奴主没有两样。

大致说来，贵族和寺院各占有全西藏土地的百分之三十左右，其余的百分之四十左右属于封建政府。

建筑在这样反动的、黑暗的、野蛮的农奴制基础上的西藏政教中权，当然就是一小撮最大的农奴主的集合体。在这些最大的农奴主中间，不可避免地要产生各种可怕的腐败现象和内部斗争。在达赖喇嘛周围的一部分掌握权力的高级官员中，为了争权夺利互相残杀毒毙的事件层出不穷。达赖喇嘛，并不是象尼赫鲁所谈的那样，无条件地被这些人非常崇敬；相反，这些人经常把达赖喇嘛当作傀儡，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他，在他们认为必要的时候，甚至把达赖喇嘛本人活活害死。例如，人们知道，1855年，达赖十一世只在十八岁的时候就在布达拉宫暴亡；随后，1875年，达赖十二世又在二十岁的时候在布达拉宫暴亡。英帝帝国入侵西藏以后，西藏上层反动统治者倾巢异己的手段，也更加卑鄙和残酷了。1923年，班禅九世被迫终身逃亡内地；1947年，担任了八年摄政的热振呼图克图被逮捕并勒毙狱中；同年，现在穆索里的达赖十四世的父亲，也因为具有爱国思想，被里通外国的反动分子为了便于控制达赖喇嘛而毒死；1950年，致力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格达活佛，在昌都被毒死和焚尸灭迹。这些著名的罪行，都是西藏统治集团中外国干涉者的走狗干的。

这个社会过去确是停滞不前的，不但经济衰败，文化落后，连人口也不能增殖。但是，这个社会的制度丝毫也不“温和”，丝毫也不“人道”！这个社会制度是一个十足的落后、反动、残酷、野蛮的制度！

试问世界上一切大吵大闹的所谓西藏人民的同情者：你们同情的“西藏人民”是谁呢？你们所宣传的西藏的自治或“独立”是谁的自治或独立呢？你们痛哭哀悼的西藏叛乱的失败是谁的失败呢？看起来，很多所谓“同情者”只是假冒西藏人民之名，假冒西藏活佛之名，假冒人道之名。他们所同情的并不是西藏人民，而是西藏人民的世世代代的压迫者、剥削者、屠杀者，而是西藏的吃人制度的首脑。在西藏的大农奴主剥出农奴的眼睛和心脏来的时候，这些同情专家不觉得是悲剧，不向这些农奴主要求温和和人道。在这些大农奴主向驻守在自己国土上的人民解放军举行武力进攻的时候，在他们用野蛮的方法残杀被他们俘虏的解放军战士和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的时候，同情家们只是叫“打得好”，只是鼓吹这些农奴主能够进行百年的游击战争，也不向他们要求温和和人道。而唯有在人民解放军对于这些坚持叛乱的奸匪由防御转入进攻的时候，也就是说，唯有在这个世界上最残酷最野蛮的农奴制度由于武装匪徒叛乱失败而最后遭遇到危机的时候，一切什么悲剧呀、同情呀、人道呀、自治呀、独立呀的叫喊，就象潮水冲破了闸门一样地泛

激起来了。由此可见，进行这种叫喊的人们，除了一些是出于误会以外，根本是最反动的农奴制度和最野蛮的大农奴主的卫土，根本是西藏人民自由解放的敌人。也正因此为这样，这个悖悖图式的反革命的“神圣同盟”，才会把美国国务院、英国殖民主义者、南朝鲜李承晚、南越吴廷艳、中国蒋介石和印度的反动党派人民社会党、人民同盟联系在一起。这有什么奇怪呢？

我們感到惊异的是，印度总理尼赫鲁先生，一方面显然把这个同盟中的许多肮脏人物有重要的矛盾，懂得他們所玩弄的不利于印度、不利于中印友好、不利于尼赫鲁自己的阴谋诡计；另一方面却不由自主地被这个同盟推到他們的所谓“同情”西藏运动的重要地位，而讓他們坐山观虎斗，拍手称快。我們現在被迫在自己的評論中同尼赫鲁先生有所爭辯，这是我們非常难过的事。尼赫鲁先生是我們尊敬的友好邻邦印度的总理，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政治家之一。对于我們来说，尤其不能忘記的是，他是一位中国的友人，一位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的反对者。而且，他对于社会进步，也曾經发表过不少开明的言論。例如，他在1934—1935年在獄中所写的“自传”中，尽管对共产主义表现很多誤解和偏見（他自己也說，他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的”），带着在资产阶级环境的“熏陶中所养成的一切偏見”，但是他仍然承認，由于用科学方法研究过去的历史和当前的时事，“马克思主义的作家对今天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做出了最精辟、最深刻的分析”。他并且說：“經济利益形成各团体和各阶级的政治观点。理智或道德的看法都不能超越这种利益。个人可以接受教化，可以放弃特殊的权利，虽然这是少有的事情，但阶级和团体却不会这样。因此，唯一一个統治的特权阶级使它放弃它的权力和特权，这样的企图一直是失败的，似乎也没有什么理由說将来能够成功。”尼赫鲁在这里說得很对。但是，他在1959年4月27日的講話中却唱着一種多不不同的調子：他或者是完全拋棄了他以前发表过的見解，或者是实际上沒有了解他會以为了解过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他現在竟說我們沒有能够廢除統治西藏的特权阶级使它放弃权力和特权，而且企图把对于西藏社会的阶级分析作为“煽为陈腐的字眼、措辞和口号”一笔勾销，把极端反对的农奴和农奴主这样两个阶级，描写成为“担心可能会在改革的名义下对自己采取什么行动”的一个单一的社会！当然，尼赫鲁的这个企图是我們所无法同意的。西藏社会的阶级对立是一个活生生的事实，根本不是什么字眼、措辞、口号的問題，更說不到什么陈腐。改革当然要求行动，当然要有利于绝大多数要求改革的人，只是不利于极少数反对改革的人。在西藏的情况下，改革首先就是要有利于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的一百四十万人。其余占人口百分之五的六万人，这里面也有各种不同的情况。坚决反对改革，直至举行叛乱和死不悔改的，只是其中的极少数。我們已經說过，两万左右的叛匪大部分是被裹胁欺騙的劳动人民（任何反革命军队都是如此），如果除去其中三分之一左右的康巴人，那么，参加叛乱的西藏人只占西藏一百二十万人的百分之一点。因为整个西藏上层阶级都改变了的想法是不正确的。而且，在这六万人中还有相

当一部分贊成改革的开明人士。因此对于上层阶级也必须分別情况，适当对待；这是我們所一向坚持的政策。如果说，上面說的这些不同情况的人对于改革都是同样担心的，在心理上或感情上都是同样有障碍的，那是不合乎实际的。至于要求改革的绝大多数人，他們对于改革有什么要担心，有什么心理上感情上的障碍呢？

尼赫鲁在討論西藏社会的时候，虽然并不反对改革，也不否認既得利益集团在叛乱中的作用，但是整个說来，他不但沒有涉及到这个社会的极端残酷的剝削制度，而且实际上把绝大多数被剝削者和极少数剝削者混为一談；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否認西藏叛乱要由少数上层反动分子負責，把中国人民平定叛乱的正义行动說成是“悲剧”，对于叛乱表示同情。这样，他就犯了一个极可惋惜的錯誤。作为印度的朋友，作为尼赫鲁所討論的問題的当事人，我們認為，指出这个錯誤是必要的。如果同意尼赫鲁的邏輯，那么，不但西藏的革命是不能允許的，整个中国的革命也是不能允許的。大家記得，中国汉族地区在解放前虽然不是农奴制度，但是基本上也沒有脱离封建社会的范围。这个社会也是一向被称为停滞不前的、沒有变化的、与世隔絕的社会。有些人也曾經嘲笑我們是从陈腐的、过时的、极端简单化的和完全不合国情的外来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断言我們的改革运动将受到整个社会整个民族的抵抗，甚至宣布我們是分裂民族，背叛祖国，是听命于莫斯科的所谓“赤色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等等，等等。現在历史已經作出結論：正确的我們而不是他們。所有对于共产主义者的种种攻击和誹謗，一概都彻底地破产了。停滞不前的、沒有变化的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一变而为生气勃勃、迅速前进的中国，証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是放諸四海而皆准的。过去的停滞不前，不过是因为生产力的发展受到落后的生产关系的束縛罢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真正代表着民族的利益和祖国的利益，而那一小撮自称为代表全民利益的反共分子，尽管也曾暂时迷惑过一部分群众，却真正被証明为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我們相信，中国历史的这个結論，尼赫鲁总理也是不至于反对的。但是按照尼赫鲁在西藏問題上的邏輯，只要他的同情不仅仅限于“西藏人民”，而扩大到整个“中国人民”，那么，整个中国革命也就要变成令人百信难过的空前的大“悲剧”了。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时期，蒋介石的国民党和国民党军队比西藏的兩方左右叛匪多得多，說他們不止是“上层反动分子”的“理由”也多得多，战争的規模也大得多，总之，值得引起的“同情”也应该强烈得多。但是，据我們所知，尼赫鲁总理在同情整个中国的时候，并没有同情于汉族的“大农奴主”；而在同情中国的一部分——西藏的时候，却同情于西藏的“小蒋介石”。这种极端的矛盾，究竟令人如何理解呢？

尼赫鲁先生可能說我們不公平，因为他所說的只限于西藏，而西藏人跟汉族人是不一样的。这就是說，汉人在西藏人中間領導革命，不可不可避免地遇到民族的障碍。西藏人跟汉族人不同，千真万确。不但如此，蒙古族人、维吾尔族人、僮族人、回族人、苗族人、朝鮮族人，以及中国的其他許多少数民族，也都跟汉人不同。在中国共产主义者和中国政府面前，存在着普

內的少數民族問題。我們是十分謹慎地對待這個問題的。我們用了近十年的時間，培養了各少數民族自己的幹部，並且在漢族人民中，特別是在漢族幹部、共產黨的漢族黨員和人民解放軍的漢族官兵中，認真地進行了反對大漢族主義的教育。我們採取了資本主義世界上沒有先例的辦法，在漢人占人口多数的民族杂居地区設旗漢人，建立了少數民族的自治區。例如內蒙古自治區、廣西僑民自治區、寧夏回族自治區和一些自治州、自治縣，就是這樣建立起來的。在西藏，為了爭取西藏上層分子的合作，我們用了特別大的耐心，在和平解放了八年之久的時間里，一直保存着原來的西藏地方政府，它的一套制度、它的軍隊甚至它的貨幣，一直說服西藏人民暫時不要進行他們所迫切要求的改革。如果中央人民政府像斯達林喇嘛所說，不給原西藏地方政府任何自治的權利，那麼，那些叛國有據的反動分子早就會被逮捕處決，西藏的民主改革也不會拖延到現在了。中央人民政府對西藏反動分子採取了如此仁至義盡的態度，甚至在拉薩叛亂爆發以後，甚至在知道達賴喇嘛已經被劫出拉薩以後，人民解放軍西藏軍區的部隊還是一直等到叛匪向軍區直接發動了武裝攻擊的七小時以後，才開始解決。很明显，到了這一步，反動分子已經把和平解決的路堵死了，除了堅決討伐和平定叛亂以外，任何其他的方法都沒有可能了。人民解放軍既然有力量迅速平定拉薩地區的叛亂，如果它願意先下手，當然早就可以把布希林卡包圍起來，使叛匪無法逃往喇嘛廟。每個明白事理的人都會想一想，都會懂得這個道理，而決不會去理睬什麼西藏三叛地彈打向西藏、落入池塘的謠言。中央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軍面對着這種嚴重局面，始終堅持不打第一槍的方針，正是說明了共產黨人對待民族問題始終是很慎重的，對於爭取西藏上層分子尤其盡了最大的努力。這種政策，只有革命的無產階級才能認真執行，資產階級或者其他剝削階級就是想要這樣作，也是作不到的。

在這里，在民族關係問題上，根本的關鍵仍然是階級分析的方法問題。尼赫魯先生希望我們“爭取他們友好合作”，這無疑是一個好的主意，雖然尼赫魯先生的意思是為了間接地指責我們過去和現在沒有這樣作。事實上，只有革命的無產階級才能徹底地正確地解決歷史上的民族問題。民族之間的糾紛和隔閡，基本上是剝削階級造成的，剝削階級也永遠不可能消除這種現象。但是各民族的勞動人民，在革命的無產階級的正領導之下，完全能夠通過一定的努力，消除歷史上遺留下來的每一切糾紛和隔閡，結成兄弟般的融洽的友誼。中國歷史上有過長時期的民族壓迫和民族鬥爭。蒙古統治者和滿洲統治者壓迫過漢人、维吾尔人和西藏人，而漢族統治者也壓迫過蒙古人、滿洲人、维吾尔人和西藏人。在無產階級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情況就根本改變了。占人口絕大多數並且是革命主力的漢人，現在仍然需要派遣一部分人到內蒙古去，到新疆去，到西藏去。但是，現在不是去壓迫剝削那里的少數民族，而是跟當地民族的革命幹部在一起，幫助那里的勞動人民從本民族的壓迫者、剝削者手中獲得自由和解放，實現民主和社會主義，也就是說，建立使各少數民族的經濟和文化繁榮昌盛起來的基礎。在這些地區工作的共產主義的漢族人員，

包括人民解放軍的漢族官兵，不但沒有騎在少數民族人民的头上壓迫風，相反，他們是跟當地民族的革命幹部一道，做少數民族人民的勤務員。他們常常不避艱難，同少數民族的勞動人民同甘共苦，為他們的權利和幸福而鬥爭。這樣，各少數民族的勞動人民，以及各少數民族的一切愛國的、贊成改革的上層分子，就跟西藏的勞動人民聯合一致，象漢族人民一樣地推翻了他們本民族的上層反動分子的反動統治。這樣的各民族的糾紛和隔閡的根源就消滅了，各民族的友好合作就獲得了真正巩固的基礎。這個過程，在內蒙古，在新疆，在西北的宁夏、甘肅、青海，在西南的四川、貴州、雲南、廣西，都已經實現了。在這個過程中，領導改革的人員都竭力團結各少數民族的贊成改革的各階層人士，在改革以前，改革中間和改革以後都跟他們保持密切的合作；誠然，不可能沒有鬥爭，而四川、甘肅和青海的藏族地區還曾經有了武裝叛亂。但是，如我們在別的地方已經指出過的，這些藏族地區的叛亂，正是由西藏的反動分子利用他們的特殊地位指使和煽動起來的。

在西藏，由于那里的农奴主的統治在和平解放的過程中沒有受到變動，他們仍然能够利用合法地位指揮保衛农奴制度的旧藏軍、康巴叛匪和其他反动的政治机构，并且繼續跟一些外国干涉者相勾結。因此，在西藏，不但沒有進行改革，而且还能够发动这一次叛亂。但是，即使如此，从人民解放軍進駐西藏以來，西藏人民仍然是屢次三番地熱烈地要求改革。水深火熱中的西藏人民所担心的不是改革，他們担心的是中央人民政府过于迁就西藏的农奴主，而一年又一年地拖延改革；世界上的人道主義者諸君須知，西藏的农奴也是人，要他們相信那些无情地勒索他們、鞭打他們，挖出他們眼睛的魔鬼是他們的保护人，是不可能的；要他們相信那些熱誠地、和藹地幫助他們勞動和治病、不可他們一針一錢的解放軍战士是他們的仇敌，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这次叛亂尽管打着民族旗号和宗教旗号，尽管有高山深谷的地形，尽管有各种名目的外国援助，却完全得不到西藏人民的支持，轉瞬之間就被打得落花流水的根本原因。西藏人民对于平定叛亂的人民解放軍收繳了封建政府的官印，收繳了叛亂的槍枝，收繳了农奴主的刑具“法鞭”，普遍感到久旱逢甘雨一戰而過，這三件東西把他們壓迫得太慘了！他們給解放軍自動帶路，自動報告匪情，自動協助捕獲匪徒，搜查槍枝。只是在拉薩人民法院一處，就接收了群众自动收繳來的槍几百枝。在山南，許多村子的居民听說解放軍要求，馬上聚集起來向战士獻哈達，獻鮮紅的桃花和嫩綠的柳枝，同時向解放軍哭訴叛匪奸淫擄掠殺人放火的罪行，要求解放軍一定要替他們報仇。廣大群众很積極地在公路旁挖了四條橫沟阻挡解放軍前進，但是叛匪一走，當地居民馬上把溝填平了。解放軍一到林芝，當地的群众馬上自動組成一支援軍運輸隊，幫助解放軍運送彈藥糧食，并且跟隨解放軍一道追捕叛匪。這種感人的例子是說不盡的。叛亂一平，廣大群众很快協助人民政府恢復秩序，很快在人民政府協助下開始生產。山南的春秧雖然因為叛匪騷擾推遲了半個月，但是，在解放軍的幫助下，播種期並沒有延長。那里成群的人正在地里追糞、播種，整修渠道，并且唱出了多久沒有唱過的歡

乐的歌声。农民们纷纷询问什么时候分配土地。在根据群众要求，宣布叛乱头目的土地今年实行谁种谁收以后，劫持达赖喇嘛的主犯之一土人女奴主康策·旺济格勒在开苏溪卡的农奴，马上自动把所有劳动力组织成为劳动互助小组，共同耕种所有的土地，争取丰收。很明显，西藏的农民们相信，他们在西藏的土地上翻身作主人的日子不久就要到来了。很抱歉，我们在这里的话说得太长了！但是，关心西藏的一切善良的人们请看，这一切跟清朝以来的旧式中国军队进驻西藏的时候所遇到的景象多么不同！叛英国侵略军由印度攻入拉薩的时候所遇到的景象多么相反！試問：怎么能够把人民解放軍跟西藏人民在一起平定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之叛匪的正义行动，描写成为民族镇压和民族侵略呢？

尼赫魯先生断言，汉族社会和藏族社会两者之間很难有任何会合点，冲破双方心理上感情上的障碍的尝试不是没有作，就是作了没有成功。对于西藏的劳动人民，这个问题现在已經由事实作了答复，而且将来还会作出大量更生动的答复。这就是对于藏族的上层分子，在中国間許多人的心理上感情上的障碍，也已經在不同程度上起了变化。达赖喇嘛在被劫持的情况下完全自觉地、秘密地写给蔣冠三将军的三封信，和班禅额尔德尼·阿沛·阿旺晋美、喜饶嘉措、阿旺嘉措、黄正清等人在人民代表大会上的講話，就是这一方面的显著证明的一部分。站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方面的，有大批西藏的爱国的上层分子，拉薩的中小学的学生，有大量的上中层分子子女，叛乱一结束就走上学，而且人数比叛乱以前大大增加。可见，所谓叛乱是民族性的“革命”，叛乱的平定是民族性的“悲剧”，是没有根据的。

有一些对中国并无恶意的印度朋友，由于受了長時間的有偏見的宣传的影响，由于他們沒有直接看見西藏社会生活和人民解放軍活动的真相，而他們的報紙又很少发表中国方面的完整的資料，一时誤解中国的立場和政策，这是有可能的。但是，事实胜于雄辯，水落石出自然。我們完全相信，那些暂时有所誤解的，对于我們現在所說的話仍然將信將疑的印度朋友們，終会得出客觀的結論來的。我們希望，尼赫魯先生也是他們中間的一个。当然，尼赫魯先生有很大的自信，他有一套对于西藏問題的独立的見解。他傾向于肯定西藏地方政府的有势力集团是一群純洁的羔羊，甚至在他們向我們发动了进攻以后，他仍然認為是我們不對。我們不能要求我們的外國朋友对于中国的事情一定要跟我們一样看，我們更不能要求尼赫魯先生一定要改变他的哲學的、历史的、政治的观点。在尼赫魯先生的思想中，显然是存在矛盾的，但是，我們不打算討論應該怎样解決这些矛盾。在这类問題上，我們固然可以进行友好的辯論，也完全可以不辯論。大家家里的事務都很多，各自自扫門前雪就够忙了，何必多管他家瓦上霜呢？尼赫魯先生在北京的时候說得好：“要把一个国家的意識強加在另一个国家的头上，或者要把一国人民的生活方式強加在另一国人民的头上，任何这种尝试一定会产生冲突，危及和平。”但是，現在的問題是，一批印度人，其中不幸也有尼赫魯先生，一定要我們按照他們的主张办事。我們是很好的朋友和鄰人，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

木桥，不是完全可以相安无事嗎？你的办法如果在印度行得通，那么我們再向你学习也还不迟。究竟有什么必要象現在这样地迫不及待，甚至不惜采取某种强硬友好的干涉行为，这是我們所百思而不得其解的。

尼赫魯总理答覆印度曾經干涉西藏。他追述了印度独立和分治前后的情况，証明印度对西藏从来“没有政治的或者不可告人的野心”。我們承認，尼赫魯的話，在这样的意义上是合乎实际的，这就是說，印度政府不打算吞并西藏，或者派遣武力来干涉西藏的事務。印度始終承認，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政府享有对于西藏的主权。印度在1954年4月間中国签订了以五項原則为基础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的通商和交通協定，并且随后从西藏撤出了自己的部队，移交了印度的邮电設施。这些都是中国人民認為滿意的。但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內政的干涉，方式可以有多种多样。要說印度政府对中国西藏过去和現在根本沒有任何方式的干涉，那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人們記得，本报也公布过，1950年10月中国政府命令自己的部队进入西藏的时候，印度政府就曾經經由外交途徑进行干涉。当时，中国政府在下令进军西藏的同时，曾要求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前来北京談判。这完全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內政問題。但是，印度政府却在1950年10月21日、10月28日、11月1日三次照会中国政府，說“中国軍隊之侵入西藏不得不被認為是可悲的”，是“没有理由的”，說这对印度政府“是最为惊异和遺憾的”。照会中还提出，中国军队进驻自己的領土西藏，“将使对中国不友好的那些国家在这一国际事務緊急和微妙关头，有借口进行反华宣传”；在联合国恢复中国代表权的問題上“将会引起严重后果”，并将使那些反对人民政府参加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的国家获得有力的支持”；“会使中国地位在世界人士心目中产生偏見”，“会使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的“和平談判就难于与此同时進行”；將“不符合中国或和平的利益”；“已經大大地增加了世界的紧张形势和导向大战的趨勢”；“已經影响到印度与中国的‘友谊关系以及全世界和平的利益’”。对此，中国政府在答复印度政府的照会中曾經指出，人民解放軍进军西藏是行使国家主权，西藏問題是中国的內政，任何外国的干涉都是不容許的。这个問題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問題，是完全不相干的兩件事；如果那些对中国不友好的国家竟然利用联合国的代表权問題威胁中国不得在自己的領土上行使主权，那只是再一次表示这些国家对中国敌对态度罢了。在中国政府一再坚决地表示了这种严重的态度之后，特别是在人民解放軍在昌都地区取得了歼灭企图阻擋进军西藏的藏軍主力的重大胜利以后，滯留印度的西藏地方政府的談判代表团，终于在1951年4月下旬到达北京。經過談判，終於在同年5月达成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協定。

重提这一段經過，可能是不愉快的。但是事实终究是事实。怎么能說，印度政府从来没有干涉过西藏呢？

不幸的是，这种干涉仍在以某种形式繼續着。这种干涉发生在中国同印度政府联合声明以及和平共处五項原則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原則之后，就不能不令人更为

遺憾了。就以尼赫魯總理本人來說，他在西藏叛亂發生後發表過的聲明和談話，其中雖有不少友好的表示，但是有些話我們覺得不能認為是符合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例如，他說，「北京沒有遵守西藏同中國關於西藏自治地區的協議和對印度提出的保證。那里發生了武裝干涉」（4月13日）。「我真心希望西藏人民將能維持并且享受他們的自治，而不受其他人的壓迫和鎮壓」（4月14日）。試問，把中國對干自己的一个地方發生的叛亂實行干預定稱為「武裝干涉」，稱為「壓迫和鎮壓」他們的「自治」，并且說什麼沒有遵守「對印度提出的保證」，這一切怎麼能說不是干涉呢？印度政府堅持藏達賴喇嘛不是被叛亂分子劫持的，而是叛亂分子的領袖，既然如此，印度政府對於干預達賴喇嘛的隆重歡迎和尼赫魯總理本人到禮索里的訪問，豈不意味着對於一个友好國家的叛亂領袖的歡迎和會商么？由于印度政府始終沒有明確執行不干涉的政策，人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執政的國大黨主席甘地夫人和國大黨總書記克里希納拉大人都宣稱西藏是一個「國家」或者「自治國家」，包括國大黨在內的印度多數政党组织的「支援西藏人民委員會」公然要求把西藏問題提交聯合國，印度的報刊公然污蔑中國政府「採取強盜行徑和實行帝國主義」，污蔑中國國家元首是「可惡的敵人」，并且要求召開有所謂印度、西藏和中國三方面參加的另一次西姆拉會議^②式的會議來解決純屬中國內政的西藏問題。西藏叛亂發生以後，甚至在這以前，印度的一些政界人物和有些報刊就展開了一個誹謗中國的運動，規模之大，使人想起美國政界和報界對於古巴處決反革命罪犯的干涉。試問，對於一个友好國家的內政採取這種施加政治壓力的方法，難道能說是符合五項原則嗎？

尼赫魯總理說，印度對於西藏問題的反应實質上不是政治性的而是本能的，它主要是一種基於情誼和人道原因的同情；也基於同西藏人民久遠的宗教和文化联系所造成的亲密感情。我們了解，印度人民對於中國的西藏人民具有亲密感情。不但如此，印度人民對於整个中國人民也具有亲密感情。周恩来總理訪問印度時，到处听到「印度人中國人是兄弟」的熱烈口號，此情此景，恍如昨日。對於西藏人民的感情，怎麼能僅用作為一些政界人士損害對中國人民的感情和干涉中國內政的理由呢？這種邏輯具有一种显然的危險：如果這樣的邏輯是可以成立的話，那末，在西藏走上了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繁榮強盛的道路之後，是不是也可以用久遠的宗教和文化联系為理由，組織什么「支援阿薩姆邦人民委員會」，什麼「北方邦事務委員會」，來干涉印度的阿薩姆邦或者北方邦的事務呢？西藏自治區政府以及整個中國政府，是否也可以把對於阿薩姆邦人民或者北方邦人民的深切同情宣布為一項基本政策，并且根據這種政策對那些邦的事務指手划腳呢？如果印度政府可以用對西藏人民的深切同情和悠久联系為理由，要求中國政府給予印度某種保證，那麼，中國政府不是也可以干預用對全中國人民的深切同情和悠久联系為理由，要求中國政府對全部內政給予印度某種保證嗎？同樣，中國政府不是也可以用對印度人民的深切同情和悠久联系為理由，要求印度政府對自己的內政給予中國某種保證嗎？那還有什麼和平共處，什麼五項原則可言呢？世

界不是就陷在互相干涉的混亂中嗎？我們相信，我們的印度朋友一定跟我們一樣，不會歡迎而且也无法容許這樣一種國際秩序。

把印度方面前後兩次對於中國西藏的干涉联系起來，人們不难看出，印度政府雖然不打算占領西藏，或者使西藏正式獨立，但是的確力圖阻撓中國在自己的領土西藏行使完全的主權。印度的一些政界人士在這一方面繼承過去英國政府的傳統，只承認中國對西藏的所謂「宗主權」，有如印度對於不丹和錫金的「宗主權」。他們所謂的西藏「自治」，不同於中國憲法上所明文規定的民族區域自治，不同於內蒙古、新疆、廣西、宁夏等地的民族區域自治，而是一種半獨立状态。不錯，西藏不是一個省，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个自治區，它比省具有憲法和法律所規定的更多的權限，但是它決不是什麼保護國——既不是中國的保護國，也不是印度的保護國，也不是中印兩國共同的保護國，也不是中印兩國之間的什麼緩沖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於西藏地方享有完全的主權，跟對於內蒙古、新疆、廣西、宁夏等地享有完全的主權一樣，這是絲毫不容怀疑的，這是絲毫不容任何外國或者聯合國以任何名义任何形式干涉的。因此，西藏的任何問題，都只能由中國解決，在中國解決，而不能在任何外國去解決。西藏的任何半獨立状态不利於西藏人民，不利於全中國人民，不利於印度人民，不利於中印友好和亞洲和平，而仅仅有利於西藏的英國的、反動的大奴才主和支持這伙英國的、反動的大奴才主的外國干涉者，仅仅有利於那些企圖在中印兩國之間制造糾紛的擴張主義分子和帝國主義陰謀家。中印兩國是兩個愛好和平并且具有悠久友誼的國家，我們兩國有一千種一萬種理由要和睦相處，互不侵犯，互不干涉，而沒有任何一種理由要互相沖突，要設什麼緩沖地區；如果硬要設，那就恰恰是要製造永不存在的真正可惡的沖突了。鑒於印度政府在这个問題上的态度，鑒於印度一些并不負責任的人士的言論，我們認為，徹底澄清這一點，對於巩固中印友誼是十分必要的。尼赫魯總理在4月27日講話中提及五項原則的時候，只說到「互相尊重」（這無疑是必要的），而沒有提「互相尊重領土完整和主權」（這是五項原則的原話，而且是任何互相尊重的前提）。我們希望，這不過是一種疏忽。

印度的一些政界人士對中國內政的干涉，不是一種偶然的現象。它帶有時代的特徵。印度是一種懷脫英帝國主義殖民統治而獲得獨立的国家，它要求在和平的國際環境中發展民族經濟，廢除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勢力存在着深刻的矛盾。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印度的大資產階級跟帝國主義又有千絲萬縷的联系，對外國資本有一定程度的依賴性。而且，大資產階級的階級本性，也決定了它的某種向外擴張的欲望。這就使它在反對帝國主義干涉政策的同时，又多多少少地有意無意地反映某些帝國主義干涉政策的影响。在國際事務中，以尼赫魯總理為首的印度政府，在反對戰爭、維護和平、反對殖民主義的問題上，在執行對中國友好、對蘇聯和其他社会主义國家友好、不參加美帝國主義的軍事集團的外交政策上，一般地反映了印度人民的意志，起了并且繼續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由於历史的原因，印度大資產階級

却繼承着而且企圖繼續保持英國殖民統治者所留下的某些遺產。當然，偉大的印度人民對於印度資產階級的這種兩面性不負任何責任。我們也相信，不但印度人民，而且印度政府中的一切有遠見的明智的人士，都承認印度的出路是在進步方面，是在向前看，而不是向後看。我們跟他們一樣地認為，一個不久以前才獲得獨立、而現在也還受帝國主義干涉者威脅的國家的當局，竟然干涉自己領國的事務，這是現代國際政治中一種令人惋惜的現象。

我們跟尼赫魯先生可以有這樣那樣的意見分歧，但是在這一點上大概是沒有分歧的，就是中國並沒有干涉印度的內政。中國人民只是在印度方面發出了大量的污蔑性的言論之後才開始回音的。尼赫魯總理在4月27日的講話中正當地譴責了某些印度人的旨在破壞中印友好關係的言行。可惜，他隨即集中力量攻擊中國的「反干涉論」。他說：「中國的負責人物對印度所作的評論和指責，是『不顧事實真相和禮節，使用了冷戰的語言』。但是，中國藉資印度方面的干涉是有事實根據的，已如上述。中國與邊界外疑難迭出顧慮聲明真實性，也是有事實根據的，這個聲明中的大量漏洞和冒名頂替的痕迹，現在仍然是客觀地存在著。很明顯，那些把達賴喇嘛劫到印度的西藏反動分子，跟那些長期以來聚集在噶倫堡進行叛國活動的西藏反動分子在一起，正在竭力反對達賴喇嘛的聲明，來堵塞達賴喇嘛回到祖國的道路，而這是尼赫魯總理多次表示的願望不相符的。」

說到重視事實真相和禮節，我們感到遺憾的是，印度的一些政界人物和一些報刊，在過去一個多月中國對中國所說的很多話，決不能認為合乎事實和禮節。我國人民注意到，尼赫魯總理在這一方面的不止一次地起了節制作用，這無疑是有益於中印友好的。但是，我們究竟不能說，在他指責中國中央人民政府破壞十七條協議、提出所謂中國對印度的「保證」等等時候，他的話也是合乎事實真相和禮節的。至於說到冷戰的語言，那麼，印度的一些政界人士和報刊，咒罵中國是「新的和印度的帝國主義」、「擴張帝國主義」，攻擊中國不許西藏叛亂是「軍事干涉」、「殖民行動」、「強盜行徑」，所有這些，難道不正正是「冷戰的語言」嗎？對於這些「冷戰的語言」，我們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一再忍辱，作了最大限度的克製，我們的報紙幾乎守口如瓶。人們記得，直到4月18日，周恩來總理還在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發出維護中印友好、熱誠呼呼。但是令人痛心的是，這一切所追求的却是對於所謂達賴喇嘛聲明的大事宣揚，却是對於我國政府和我國人民的最放肆的攻擊。這還可過了，我們不得不起而反擊。有人企圖用「言論自由」來為印度的反華排華運動辯解。但是，他們為什麼不想一想，難道中國人就沒有言論自由嗎？西藏是我國的領土，西藏問題是我國的內政，外國人而且可以有利用本能的反應，我國人民反而沒有本能的反應嗎？現在，某些外國對於我們的排華運動似乎已經達到了低落，理智正在重占上風。但是，也還有极少数人企圖繼續煽風放火。我們可以告訴這些人：你們的排華運動一天不停，我們的反擊就一天不止。你們願意用多長的時間，我們就準備付出多長的時間，而且還準備看你們煽動別國的國家來對我們進行圍攻，也準備看你們後面還有世界

上一切帝國主義分子的助威。但是，想用任何壓力來干涉中國內政，來挽救西藏大奴才們的窮凶極惡的統治，那是毫無希望的。世界上一切反共反華的人們對於我們越罵得凶，就越能暴露他們的真面目，也就越能教育全世界人民。

如前所說，現在世界上議論西藏問題的人很多，他們的出發點有許多不同。尼赫魯總理跟許多對中國顯然懷有惡意的人們不同。他跟我們在西藏問題上有些某些分歧，但是在总的方面，他是主張中印友好的。對於這一點，我們沒有任何懷疑。我們所以對於尼赫魯總理的指責作這樣詳細的答復（當然在文章里也有不少地方涉及了那些對我們顯然懷有惡意的人），正是因為，我們懷有充分的信念：分歧是可以縮小的，爭論是可以解決的。誠然，爭論是有些尖銳，因為這是我們祖國和西藏人民的切身利益所在。但是我們仍然希望，我們的爭論從本質上能夠有益於兩國人民的相互了解，有益於兩國人民和兩國政府的友好，並且在語言上也能夠沒有疏忌之友誼和禮貌。我們完全同意尼赫魯總理的一些語重心長的、對中國人民十分亲切的話。他說：「我們非常希望保持印度和中國之間的友誼。『如果印度和中國這兩個亞洲的偉大國家，這兩個過去世世代代一直是和睦的鄰邦的國家，竟然彼此產生了敵對情緒，這將是一個悲劇。』中印友好是有悠久歷史和深厚基礎的，我們的基本利益相同，我們的主要敵人相同，我們決不會忘記我們的共同利益，而落入我們的共同敌人的圈套。這次的爭論雖然令人遺憾，但是我們堅決相信，它不會造成敵對情緒，它也不會動搖我們兩國的友誼。尼赫魯總理宣布：印度一點也不想干涉西藏。我們熱烈歡迎這個友好的聲明。只要印度方面停止干涉西藏的言行，目前的爭論就會隨之結束。中國從來沒有也永遠不會干涉印度。我們還願意鄭重地告訴中央印度安全的全部印度愛國者：一個民主的、繁榮的、作為中國各族人民大家庭之一員的西藏自治區，必然會成為鞏固和加強中印友好的因素，而決不會也決不可能成為對於印度共和國的什麼『威脅』。社會主義中國的和平睦鄰政策是永遠不會動搖的，我們兩國近十億人民的友誼是永遠不會動搖的，就象喜马拉雅山的不會動搖一樣，那些排華者的胡說八道是毫無根據的。在尼赫魯總理1954年10月訪問我國的時候，他曾經說：『中國和印度都是大國，面對着類似的問題，並且都已經堅決地走上前進的道路。這兩個國家彼此了解愈深，那末，不但亞洲的福利，而且全世界的福利就會有保證。今天世界上存在的緊張局勢，要求我們共同為和平而努力。』我們願意兩國人民永遠記住尼赫魯總理在這里所指出的真理。跟中國人民一樣，偉大的印度人民是一貫珍惜中印兩國的友誼的。我們深信，隨著毒化中印關係的瀟灑，隨着對於事實真相的了解，隨着兩國有關人士的共同努力，必將為印度廣大人民所識破，所拋棄。中印兩國和兩國人民，將在和平建設的事業中繼續友好合作，並將繼續為亞洲和世界的和平而携手奮鬥。」

① 克勒曼特·荷特得特於1809年先後擔任奧地利帝國的外交大臣和首相。1815年俄國的沙皇、奧地利帝國的皇帝和普魯士的國王為了共同圍剿當時歐洲的資產階級革命運動，簽訂了一個同盟條約，組成了所謂「神聖同盟」。後來，歐洲各國的君主都參加

了这个同盟。伯特兰是这个“神圣同盟”的组织者和领导人。

② 西姆拉會議是1913年10月在印度北部的西姆拉召开的所謂“中英會議”。這次會議是英國帝國主義侵略西藏的重要陰謀。參加會議的，有英國代表印度殖民政府的外務大臣麥克馬洪，西藏代表倫興喬托拉，英親政政府的代表西藏宣慰使駐滬。

英國代表一手把持西姆拉會議，在会上提出一个所謂解決西藏問題的方案，其主要內容包括：中國政府承認西藏有完全自治權，不得改為行省；中

國政府除西藏辦事長官的衛隊外，不得駐兵西藏；“中國政府與西藏有爭議時，由印度政府判決之”；“英國人得在西藏自由經商，中國政府不得加以限制”以及“西藏內政暫由印度政府監督，英國政府得派代表常駐拉薩”等等。很显然，英國提出这个方案的目的，是要使西藏與中國分裂出去，由英國在印度的殖民政府統治西藏，奴役西藏人民。因此，这个方案遭到中國人民的堅決反對，當時的宣慰使政府也拒絕接受。

〔5月6日“人民日報”〕

讀 尼 赫 魯 總 理 的 談 話

“人民日報”評論員

印度總理尼赫魯在4月24日會見達賴喇嘛之前和以後，接連發表了幾次談話。尼赫魯總理在會見達賴以後發表的談話，証實了達賴喇嘛所寫的關於他被西藏反动分子劫持的信件是最實的。這當然會促使印度輿論界和政界在這個問題上的許多不正確意見得到澄清。此外，尼赫魯總理還表示仍然願意堅持和平共处的五項原則，并且一再表示希望印度的那些就西藏問題大發議論的人們“運用智慧和自制，在這個問題上說什么話的時候要有責任感”。我們歡迎尼赫魯總理的這些有益于中印友好的表示。

達賴喇嘛寫給譚延三將軍的三封信，對於認識西藏叛亂的性質和達賴喇嘛在3月10日以後的處境，是一個重要關鍵。在這三封信里，達賴喇嘛不僅像尼赫魯總理解說所說，“希望避免同中國人發生衝突”而已。他再三指明他是被“挾阻”，被“危害”、“生命難保”，而那些以“保卫”他為名而圍困他，危害他的人是“坏人”，是“反動的坏分子”，是“違法”的“反動集團”，是“狂妄”的、“嚴重鬧開中央與地方關係”的、“反對革命”的“反動分子”。達賴喇嘛因為受到這些反動分子的劫持而“無限忧伤”，而“傷害難言，忧虑交加，处于莫知所指的境地”。這還不是完全証明了他確是被劫持了嗎？達賴喇嘛雖然“設法平暴”，違法行為，“責令非法的尼赫魯必須立即解散”，以“保卫我為名而任意逮捕駐羅布林卡的反動分子必須立即撤走”，并“向政府官員等的代表七十餘人進行了教育”，但是非常明顯，他的已經背叛了政府官員根本不聽他的命令。据參加達賴喇嘛在3月14日召集的會議的塔勞士登丹巴明說，達賴喇嘛在這次向政府官員進行教育的會議上曾經明白宣布：“有些人可能認為我到印度去為好，這種作法只能是為了個人的安樂。以前我去過亞東，前年也去過印度。住在那邊是不行的，我只想在自已的土地上享受果實。”根据達賴喇嘛3月16日寫給譚延三將軍的第三封信，他當時的計劃就是在几天以後“採取秘密的方式前往軍區”，并要求軍區“亦採取可靠的措施”。直到3月17日下午四時，据尼赫魯總理的談話說，達賴喇嘛仍然沒有想到離開拉薩，流亡印度。忽然，尼赫魯總理接着說，當“据斯南（印度报业托拉斯原注是指出達賴喇嘛在提斯浦爾發表的聲明）說‘那些他或者什么东西落在他的宮殿’——不管是什么原因——的時候，這于是就對他的想法产生了強烈的影

响。既然一切都完了，‘我們走吧’，于是他們就在六小時以內离开了。”請注意：据4月18日提斯浦爾聲明，是“迫击炮打了兩三炮”，幸而炮彈都落到附近的一个池塘里去了。”只隔了六天，炮彈后面就加上了“或者什么东西”，“池塘”就變成了“宮殿”，而且加上“不管是什么原因”；两个或者两三个不知什么东西不知什么原因落到宮殿或者附近的一个池塘里，就会使被劫持的達賴喇嘛忽然得到自由和权力，“自願”同他所深惡痛絕的反動分子离开拉薩到他不願意去的地方！这一切难道能使任何有客观态度冷靜头脑的人信服嗎？這还不是明明証明，劫持達賴喇嘛的叛亂分子向達賴喇嘛任意編造了一个惡吓他的謊言，（也就是提斯浦爾聲明所謂“顧問們認識到對於達賴喇嘛人身的安全……离开拉薩就成為十分緊迫的了”）就此不由危險，把他劫出拉薩，劫到印度去了嗎？印度孟加拉文日報“划时代報”4月20日的評論說得好，如果達賴喇嘛給譚延三將軍的三封信“甚至有一定程度的真實性的話，那么達賴喇嘛目前的聲明（指提斯浦爾聲明）还有什么价值呢？我們懇切地希望，所有印度的朋友，包括我們尊敬的尼赫魯總理，終于能够達到同我們一樣的結論，即：既然達賴喇嘛自己証實了他寫給譚延三將軍的三封信，他就是確被劫持了，而提斯浦爾的聲明就仍然量被劫持的產物，完全不能代表達賴喇嘛的意志，完全不能反映西藏叛亂的真實情況。

尼赫魯總理在24日對國大黨人說：西藏事件為印度造成了困難問題。印度政府正面臨著一種已經引起了混亂的困難局面。尼赫魯總理的這種心境是可以理解的。尼赫魯總理說，在还不了解全部事實的時候就對一些複雜的問題表示意見，是不太負責的做法。我們以為，印度政府的傾倒在相當的程度上是由由此而引起或者由此而增加的。

印度政府再三聲明，西藏是中國的領土的一部分，印度對西藏決沒有領土的和政治的野心。但是印度某些政界人士對於中國在西藏的內政如此熱心于干預，却遠遠超過了一個耐心的友好的鄰邦所能忍受的限度。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嚴重的國家，它對於它所宣布要實行的東西都有強硬的底線。中國一定要解放西藏，中國人民解放軍就果然進駐西藏。中國的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簽訂了和平解放的十七條

協議，規定在西藏要實行民族區域自治，中央人民政府就嚴厲嚴格執行七條協議，假使帝備西藏地方自治，這種自治本來早已實現了（就象在內蒙、新疆、廣西、寧夏一樣），如果不是原西藏地方政府竭力阻撓的話。中國和印度簽訂了關於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的通商和交通協定，其中首先規定了和平共处的五項原則，中國政府就嚴厲嚴格遵守這個協定，嚴格執行五項原則，不干涉印度的內政，也拒絕任何外國干涉中國的內政。我們的印度朋友熟知中國的這種態度，而且沒有理由非難中國。既然如此，中國的某些政界人士為什麼硬要在西藏問題上懷疑中國政府的正式文告，硬要進行不信任中國和干預中國內政的宣傳，因而自尋煩惱呢？

尼赫魯總理說：我們對別人說我們的一切話不能充耳不聞。這大概是中國人民近日對於印度擴張主義分子干涉中國內政的反應。雖然，中印兩國具有悠久歷史的友好關係，在過去幾個星期中受到了損害，這是令人惋惜的。但是這並非中國方面的過錯。誰都知道，中國並沒有干涉印度的內政，而西藏並不是印度的領土。但是在西藏叛亂事件發生以前，從今年2月開始，印度的一些報紙上就散佈了許多預告西藏將要發生叛亂的言論。而在西藏叛亂事件發生以後，印度的許多報紙簡直就遇過了節慶一般，連篇累牘地發出了大量的對中國不友好的言論。據對二十九家印度報刊於2月24日到4月7日（沒有包括最近最高漲的二十天）的統計，就發表了有關西藏叛亂的新聞和評論三十一萬餘字。但是大家知道，中國的反應在長時間內是異常克制的。甚至有人印度的國會中誹謗中國政府，並且在中國駐印度的使館和領事館門前

組織了反華示威之後，周恩來總理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仍然表示希望兩國的友好關係繼續發展，並沒有對這些極不友好的言行加以譴責。但是，這一切並沒有使印度的那些擴張主義分子知所收斂。他們利用所謂達賴喇嘛的聲明，對中國大肆攻擊，公然要求“西藏獨立”，要求召集新德里、北京、拉各斯三方面的國庫會議，在報紙上發刊污辱中國元首的漫罵，甚至組織污辱中國民族元首的示威。是可忍，孰不可忍！直到這時，中國人民才表示了不能遏止的義憤。雖然如此，珍惜中印友誼的中國人民，始終沒有象一些蓄意破壞中印友誼的印度人那樣地行動。相反，我們的斗争限於反對印度的干涉者和擴張主義分子，對於這些人的回击是必要的。印度擴張主義分子既然在中印友好關係上上下下了傾盆毒雨，就不能不進行必要的消毒工作。否則，中印的友誼就無法巩固。

尼赫魯總理表示關心達賴喇嘛的前途。我們當然更關心達賴喇嘛的前途。我們以為，在証實了達賴喇嘛給譚延三將軍的信件的真確性以後，這個問題應當是容易解決了。達賴喇嘛本來不願意到印度，即令相信他的顧問們的話，也只是個不知什麼東西不知什麼原因掉在他的宮殿或者附近的池畔裏，才迫使使他莫名其妙地離開西藏。人們如果真的同情達賴喇嘛，而不是同情那些劫持達賴喇嘛的方惡的叛匪，就有道義上的責任幫助他實現他在給譚延三將軍的信件中的願望。我們相信，除非劫持達賴喇嘛的人下決心，硬要使他離開西藏永遠退出西藏的政治生活，而印度方面也贊助他們的這種決心，否則，達賴喇嘛終于會回到可愛的祖國來的。

（4月27日“人民日報”）

印度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關於“加強印中友誼”的決議

印度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於5月9日到12日在德里舉行了會議，會議通過了關於“加強印中友誼”的決議。決議全文如下：

在過去幾年中發展起來的印度和中國之間的親密友誼，是我們的時代的最偉大的事件之一。它在維護和平和在亞非國家的復興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它是社會制度不同的國家和平共處和合作的典範。

這種友誼加強了我們兩個偉大國家的獨立和安全，並且加強了亞非的團結。它是抵禦殖民主義和戰爭勢力的自由和世界和平的堡壘。由於印中友誼的發展，帝國主義逐漸陷於孤立，並且被推回去，亞非各國人民的尊嚴和地位有了提高。潘查希拉之所以具有世界歷史意義，正是由於這種印中友誼和諒解。

然而必須承認，在西藏事件發生之後，這種友誼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損害和破壞。因此有必要了解這些事件的真正意義。

中華人民共和國西藏地區所發生的事件是一小撮農奴主和頑固派組織的一次叛亂，目的是阻撓一切改革，从而使野蠻的壓迫和暴政永遠保持下去。他們不想使西藏人民得到現代文明的光明，而使他們仍然陷於落后、奴役和無法形容的苦難的無底深淵中，這些反動分子在他們的叛亂中受到了帝國主義者的鼓勵，

甚至得到了帝國主義者的物質幫助。正是在他們的煽動和幫助下，前西藏地方政府才成為一個腐敗的中心，並且濫用了廣泛的自治權，並且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當局和它的西藏地區地方政府在1951年所達成的協議而準備了現在的叛亂。因此，帝國主義者——美巴双边條約和東南亞條約組織等的煽動者——迫不得已地來西藏叛亂，認為這是執行他們破壞中印友誼和亞非團結的陰謀和侵略性計劃的新機會，這是不足為奇的。

中央執行委員會着重地聲明，這個叛亂同西藏人民的利益是毫無關係的。這個叛亂的目的只是為內部的一小撮反動勢力和國外帝國主義的利益服務的。把這樣一個叛亂說成是“民族起義”是不正確的，並且是非常容易使人誤解的。

印度所有愛國者當然將珍視印度同西藏人的文化聯繫，但是不能通過對農奴主和封建压迫者表示同情來這樣做。今天的印度對農奴制和中世紀壓迫的勢力是不能有任何同情的。印度同西藏人的文化聯繫只能在開明和進步、在潘查希拉的共同發起人——印度和中國之間的互相尊嚴和互相了解的前提下發展。

但是中央執行委員會注意到，西藏的事態發展正在被我國的某些人加以歪曲和利用，不僅被用來妨害

印中关系，而且还被用来破坏潘查希拉和印度的外交政策。他们公开鼓吹西藏独立，并且鼓动印度干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政以促成这个目的。他们要求藏已经逃离自己的祖国，现在在印度的叛乱分子有一切自由和机会继续进行他们的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活动。他们还要求允许这次叛乱的煽动者和组织者可以作为西藏政府以我们的国土执行任务和进行他们所谓“争取独立的斗争”。他们的言论是在进行仇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运动的的同时发表的。

这些势力中最主要的是人民社会党、印度人民同盟和印度教大会以及其它潘查希拉和印度外交政策的死对头，包括有名的美英分子在内。

这些党派现在联合起来进行它们煽动印度反对中国的凶恶运动。它们在制定印度的外交政策中没有起任何作用。相反，它们一直谴责和嘲笑尼赫鲁总理，并且一贯破坏他所奉行的外交政策。

中央执行委员会警告全国提防这些分子的阴谋策略，他们对西藏的阴谋的同情永远隐藏不住他们的别有用心。他们不是从对西藏人民的任何热爱和关怀出发的。他们是从他们仇视共产党人和希望印度的外交政策遭到削弱和破坏的梦想出发的。要注意的是，甚至某些著名的国大党人也同他们携起手来，力图损害他们的领袖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先生所主张的事业。

尼赫鲁总理在制订和指导印度外交政策和建立印中友谊方面起了卓越的作用。因此，令人深感遗憾的是，在最近几个星期内，他就有好几次所表示的态度和发表的言论不能符合他自己的外交政策及其指导原则。潘查希拉，而印度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只有在这个原则的基础上才能得到维护并向前发展。

潘查希拉的基本原则之一是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西藏是中国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西藏的事实发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政。忽视这个基本事实或者缩小其重要意义的任何倾向都只会造成严重的纠纷，引起误解，并削弱印度和中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中央执行委员会要求人民注意这个事实：印度政

府方面的某些不幸的和错误的步骤正在被印度外交政策的敌人拚命加以利用，他们希望这个外交政策完全改变。还要注意的是，帝国主义者在力图使印中关系进一步恶化，使万隆精神垮台。无疑，他们和他们的朋友将在未来的时期内不遗余力地达到这个目的。

中央执行委员会强烈地希望尼赫鲁总理和一切奉行和支持印度在爱好和平的国家之间实行和平友好的政策的人们坚决反对这种势力。

委员会意识到政府受到了某些反动方面的非常强大的压力，这些反动方面仍然梦想西藏是一个在他们影响之下的缓冲国。但是委员会相信，支持印度外交政策的人们将知道如何战胜这种压力。

在印度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发生的争辩中有时出现了激烈的言词。但是委员会认为这是朋友之间的争辩，并且相信，严格遵守具有历史意义的潘查希拉所包含的和平共处原则，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解决这个争辩。

尼赫鲁先生5月8日在人民的讲话中重申印度的外交政策是以潘查希拉和不结盟的政策为基础的，他断然拒绝了关于改变这种政策的建议。中央执行委员会欢迎这个声明，认为这是对帝国主义、他们的盟友和印度外交政策的敌人的打击。中央执行委员会欢迎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这项决议重新强调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中央执行委员会呼吁一切民族和爱祖国力量挺身而出，保卫印中友谊和我们的外交政策，这不仅符合两国利益，而且是符合全体亚非人民和世界和平的利益。今天，鉴于威胁我国而且事关整个亚非地区的和平与安全的美巴边境军事协定和其他侵略性阴谋，这就变得更加紧迫了。

中央执行委员会相信最近的事件所造成的损害不久会得到弥补，印中友谊将会越来越巩固，从而有助于亚洲和全世界的和平事业。

(新华社社)

(5月15日“人民日报”)

尼赫鲁三月二十三日在印度人民院就 我国西藏地区局势发表声明

印度总理尼赫鲁3月23日在人民院就中国西藏地区局势发表声明。尼赫鲁说：“最近关于中国西藏地区所发生的事件的消息自然在我国引起很大的注意。”他说，“上星期在3月17日，在附属于外交部提出的要求的过程中，我痛楚地提到那里的紧张局势。我提到曾发生意见方面的冲突，虽然最近并没有发生重大的暴力行动。”

尼赫鲁接着说：“他3月17日在人民院的讲话，在那次讲话中他对中国西藏地区的局势‘表示关切’。”

尼赫鲁接着说：“后来我们从我们驻拉萨的总领事那里收到较详细的报告。看来关于达赖喇嘛的各种谣言在拉萨引起了激动情绪。在大约两周以前，有一大批西藏人进入了印度总领事馆。他们向我们的总领事谈到这些谣言和他们感到的不安。三天以后，有许多

西藏妇女到我们的总领事馆来，要求我们的总领事陪她们到中国外事处，为她们提出某些要求作见证。”尼赫鲁说，印度总领事对这些妇女说明不能陪她们去。

尼赫鲁谈到3月20日“中国军队和西藏分子之间突然爆发了战斗”，印度总领事馆中了一些流弹，但人员和财产均未受到损失。他说，“显然，拉薩的局势已经平静了一些”。尼赫鲁说：“人民院将了解，这是一个困难而微妙的局势，我们应当避免采取任何会使这个局势恶化的行动。我们无意干预中国的内政，我们同中国有友好的关系。在1954年签订了中印协定（按指中印两国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通商和交通协定）。潘查希拉原则就是在这个协定中第一次规定下来的。”

据外国通讯社报道，在尼赫鲁发表声明之前和以